

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

——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

吳明益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做為一個自然書寫的研究者，這幾年我始終反覆思考幾個方向論述的拓展：一是對自然導向文學、自然書寫、環境書寫相關詞義的再釐清，以及對台灣相關書寫發展的變動持續關注。二是以台灣戰後小說及詩文本為對象，持續探索這些文本潛存的「自然意識」或「環境倫理觀」。三是對於特定環境或地景的書寫意涵進行探討，第四則是對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的自然意識進行討論。本文即是對第一項議題的初步探討。

本文的第一個重點將對筆者第一階段自然書寫研究中的「非虛構」與「知識性」特質，再提出解釋。並分析此時讓研究跨越散文體自然書寫的意義，而後論及跨領域研究時，生態批評者所面臨的越界挑戰。論文第二個重點聚焦於相關創作文本，以鳥瞰的方式將四十年來台灣環境與文學的互動以戀土、覺醒抵抗、對倫理的追尋摸索與對島嶼的棲居想像分為四個進程，這四個進程並非一個取代一個，每種新的進程都仍演化至今。期以本文，對個人近年一系列的研究做一奠基的論述。

關鍵字：自然書寫、自然導向文學、環境倫理觀、文學與環境、生態批評

* 本論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意見，特此致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意見已盡可能在本文中修改，另一位審查人意見、用詞本人或有不能接受之處，回覆後也未得到具體回應，因此部分未予接納、修改。若論文有立論失當之處，文責全在本人。

Topophilia, Awareness, Find the Way, and then Inhabit the Island: Rethinking Several Issues About Taiwanese Eco-Criticism and Nature Oriented

Wu, Mi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o the study about nature writing in Taiwan, I have believed tha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some areas of this field waiting to be developed. The first need is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s of nature-oriented writing,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writing. The second is to use Taiwanese postwar novels and poetry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hidden “nature consciousness” or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se texts. The third is to investigate meaning of writing in their specific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s. Finally, the fourth is to discuss nature consciousness in the native Taiwanese Han language literature. This essay is a preliminary study regarding the first topic.

The first issue of this essay is to clarify again the meanings of “nonfiction” and “knowledge” in my study on nature writing before, and then analyze why the study must be beyond the nonfiction prose essay of nature writing now. Last, I will discuss the challenge of when eco-criticism researchers try to go beyond their research fields. The second issue of this essay is to differentiate four processes from the texts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and literature in Taiwan, including “Topophilia”, “awareness”, “find the way”, and “inhabit the island”.

The four processes are not meant to replace one another, but are still evolving now. So I hope this essay will be a foundation for my next phase study about eco-criticism in Taiwan.

Key words: Nature Writing,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

——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

大自然是外在於人性的東西，不過它跟人類心靈的最深處也是不能區分的，其中存在著人類的夢想字典及奇想目錄，若是沒有它們的話，我們不會有理性，也不會有思想。¹

一、兩個仍具意義的觀察座標

所有的問題都有個提問的起點。做為一個自然書寫者與相關議題的研究者，多年之後，在學術上與論述上常面對的問題仍然是：什麼是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什麼是生態書寫（ecology writing）？什麼是環境書寫（environmental writing）？而什麼又是自然導向文學（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事實上，這些詞的定義或許不是我關心的重點，而是思考這些詞彙時，也同時會碰觸到人們如何看待這類寫作，甚或暗藏了對這類作品的評價與期許。因為，這些詞語都意味著從不同角度觀看文學與環境的關係。所謂的「環境」，可以廣泛定義為「周圍的事物／周圍的狀況」，因為這個世界上即使是人造物，也都取材自自然界，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特地強調「自然環境」。

我在《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2004）及《臺灣自然寫作選》（2004）的序言中，曾刻意採用「狹義、文學範疇散文文類」的「自然書寫」定義來論述與選文。基本上，那樣的界義是以美國自然書寫研究者唐·史區斯（Don Scheese）所提出的「現代自然書寫」（modern

1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李桂蜜譯，《為什麼讀經典（*Perche Leggere I Classici*）》（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5.08），頁52。

nature writing) 概念為主，參酌了其他如梅貝 (Richard Mabey)、李爾勒德 (Richard A. Lillard)、史都華 (Frank Stewart)、弗利澤 (Peter A. Fritzell)、史洛維克 (Scott Slovic)、艾爾德 (John Elder) 等人的論述，並統整分析國內這類作品所呈現出的特質後所提出的。提出的時間點是這個世紀初，也是台灣尚缺乏本地此類書寫專論時的第一階段研究。更準確地說，該書專注於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生態相關學科普遍發展後書寫自然的文學性文本，因此既非談自然科學深度影響人類生活之前的傳統自然文學，也刻意聚焦在某種新類型：「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 上。因此，當時我提出了一個「暫時性界義」，包括了：1. 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2. 注視、觀察、記錄、探究等「非虛構」(nonfiction) 的經驗，成為必要歷程。3. 自然知識符碼的運用與客觀上的知性理解成為行文的肌理。4. 從形式上看，常是一種個人敘述 (personal narrative) 為主的書寫。5. 已逐漸發展成以文學揉合相關學科的獨特文類。6. 書寫者常對自然有相當程度的「尊重」與「理解」。此外，有部分是當時該書刻意不談的，包括了：1. 暫不論原住民文學。2. 暫不論詩。3. 暫不論小說。²

這樣的界義如果改以「觀察文學與環境關係」的角度去看待，當然遠遠不能涵攝台灣相關作品的全貌，正如當時我所指稱，這不過是一種階段性研究的「界義」而已，³ 目的是為了討論有焦點，有比較的基礎，並且為了刻意呈現當時台灣出現的這類新書寫。《以》書當時的論述策略聚焦於八〇年代後，因工業興起，跨國資本主義發達，環境崩毀，自然科學知識漸漸普及等現象出現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書寫模式，而這類書寫模式最接近於西方所使用的「自然書寫」一詞。而當時《以》書所做的界義，雖然被廣泛運用，但也有兩點常引起學者疑義。在本文試圖離開《以》書，論及自然書寫的第二階段研究

2 不論原住民文學的原因是我自認相關知識不足，不論詩與小說的理由則是刻意先聚焦在非虛構性的文本上。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11)，頁19-28。

3 在《以》書中我寫道：「任何一種文類或次文類在『命名』的範疇下的定義都可能是動態的、跨界的……」因此，他稱自己在做的是暫時性的「界義」，而非「定義」。同註2，頁9。

時，這幾個觀點確實也值得此刻再檢討、說明。

（一）虛構？還是非虛構？

在西方的自然書寫研究中，都認為「非虛構」是現代自然書寫的重要特質，這與自然書寫形成的背景因素有很大的關係。人類科學史上有幾次重大革命，一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與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打破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約90-168）以降，教會信仰的「地球中心說」，這不只是天文學的革命，也在人的意識深處顛覆了地球（所謂「人的居室」）是宇宙中心的宇宙觀。二是從林奈氏（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的分類法到達爾文的自然汰擇說。這也不僅是生物學、演化學的革命而已，它從此讓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從生物觀點來看，人只是地球生物中的一種，從而埋伏下日後非人類中心環境倫理的意識革命。由於這種科學革命的衝擊不是漸進的，常都是突如其來的「革命」性變化，因此會直接衝擊到當時社會的價值觀，而不只是科學觀而已。

但相對的，人類智慧形構的過程也是複雜的，即使多數科學家目前皆認為演化說的概念無誤，仍有宗教的信仰者認為《聖經》的創世論方為真，演化論為假，在美國甚至衍生出「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這樣的說法。⁴ 這類的論辯已涉及「信仰」的問題，而不只是科學的問題了。人可以信仰多數人已判斷為「非虛構」的科學證據，也可以選擇信仰宗教所提出的創世說，信仰在多數民主國家的憲法中皆獲得自由的保障，因此，我認為，信仰本身是可以擱置「虛構」或「非虛構」的爭論的。順著這個理路衍生，族群的創生神話、各類傳說，乃至於奇幻故事，當然也不會有這類的問題。

4 最早是北愛爾蘭的主教烏謝（James Ussher, 1581-1656）所推算出來的創世理論（宣稱上帝在西元前4004年創造世界），於是這樣的創世論便與達爾文的演化論成了兩個極端對立的思想。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認為演化論全無科學價值，污蔑了教義。而這樣的思維在美國更進一步衍生出「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認為有規則、繁複的世界是智慧創造出來的，一如人造物，必定有一位創世主。因此與演化論互爭在校園內的傳授權，引發多次爭論。不過在達爾文誕生200週年，演化論提出150週年的2009年，梵蒂岡教廷宣布「演化論」與「神創論」沒有抵觸，這是神學和演化論第一次在官方的說法中被接受可以共存。

不過，人們準備「相信」一件事，並依此事改變自己的信念，往往又認為「非虛構」的事實較容易說服自己。而野外經驗與自然科學的結合，使得「證據」與「合理說法」漸漸變得與「想像」在創作時同等重要。比方說，如果有一位賞鳥者觀察到大杓鵲吐食繭（將甲殼類等食物吞入後，再加不需要的物質吐出）的行為（非虛構過程），並且記述為文，發抒自己對此事的感情與想法（具有虛構、想像的性質），這兩者之間在敘事中遂形成一種依存關係，後半部的想像，是依據部分觀察的事實而衍生的。當然倘若第一部分的觀察也是虛構的，這時的文體便較屬於一般文學定義下的「fiction」。在讀者知道作品為小說的前提下，一個明智的讀者，多半會採艾可（Umberto Eco）所謂閱讀小說應「懸置懷疑」（the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說法，⁵不會去要求小說作者或小說內容要有非虛構經驗，或經得起實證的。

但許多作者宣稱自己確有實際觀察經驗的自然書寫呢？

我們回顧這類型的寫作，無論是劉克襄、廖鴻基、徐仁修、王家祥等典型作家，他們作品所提及的地點與觀察行為，乃至於觀察對象，多半讀者是信以為「真」的。倘若有一天，劉克襄說「小綠山」是「桃花源式的想像」，其中所臚列的物種，是刻意地誇張，或僅是「心靈漫遊」，做為一個專業讀者，勢必要調整對該系列書寫的評價，至少評價與切入角度會絕對不同。同樣的，若廖鴻基的出海經驗為假，是在「海岸想像海上」，甚至觀察到的鯨豚記錄皆為虛造，那麼廖鴻基在台灣海洋書寫的典範意義，還存在嗎？時至今日，評論者恐怕也不可能接受徐仁修沒有深入婆羅洲，就寫出關於婆羅洲的探險文章。易言之，行動，非虛構的行動是自然書寫或環境書寫中，散文類型作品的「本質」，有時候甚至成為一種迷人的本質。劉克襄在山徑、小鎮的浪遊，廖鴻基既追尋又放逐的海洋航程，陳玉峰在孤獨的山林裡進行「每木調查」……這些行動，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元素，部分凝聚成為環境運動的力量，較柔性的則

5 艾可的這個說法其實來自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謂懸置懷疑是「讀者必須了解書中所述是個想像的故事，但不可因此認定作者在說謊。約翰·希爾（John Searle）說，作者純粹是在假裝說實話。我們接受虛構約定，然後假裝書中所述都曾真的發生過。」艾可（Umberto Eco）著，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0.11），頁104。

成為觀鳥、觀蝶者，⁶可說是一種深度生態旅行的衍伸。因此，我認為部分論者為求「擴大」自然書寫的定義，質疑「非虛構」的意義顯然是不必要的，甚至這部分元素是散文體自然書寫展現魅力，發揮積極意義的重要關鍵。

但書寫能有「零虛構」的狀況存在嗎？

正如前文所言，除了觀察外，作者還必須呈現自己的感知、判斷、感受、想像，這些部分基本上毋需以「虛構」或「非虛構」去檢驗、要求。至於兩者的界線、比例更是這類書寫魅力所在，並沒有確定限制。以虛構或非虛構成分來判斷文本，那是根本不必要的評論量尺。專業的讀者如何在閱讀經驗中，適當評價出作者實際觀察、探險行動的價值，與隨後想像力所營構的書寫敘事，那涉及的是評論的專業，根本不是定義的問題了。亦即，虛構文本中（包括詩、小說、神話、傳說），若隱有自然意識、環境倫理觀，理應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但這類研究路向的成立，並無礙於自然書寫對寫作者在觀察行為或行動上的「非虛構」要求。我個人認為，自然書寫者應有非虛構的實際行動，但寫作時容許適當的虛構，兩者並不扞格。

夏曼·藍波安、撒可努當然可以描述他們在海洋、森林中的神秘體驗，但讀者卻很難接受夏曼·藍波安沒有潛水經驗，撒可努從未獵過山豬。也就是說，即使是以生態批評的角度擴大定義（下文會再闡述），「非虛構」仍是文學呈現人與環境關係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有的時候甚至是文學魅力的重要來源。

（二）知識？反知識？超越知識？

至於自然書寫作品中「自然知識」成分過高，或過於專業，會不會造成寫作的門檻，或根本導致閱讀者的閱讀障礙呢？因此過去幾年，或有論者質疑部分書寫太過「專業」（或用了太多自然科學詞語，這點已如上文回應）。這樣的質疑，其實並不太需要回應，因為前者涉及寫作者的天份與努力的程度，

6 Watch birds 在台灣通常被譯為「賞鳥」。但我個人認為不妥，因為「Watch」也同時有看守之意，而 watch birds 的基本精神是不干涉鳥的行為下觀看。因此譯為觀鳥較適當。

後者涉及讀者的閱讀水準，文學史中，本就有不少作品不是所有讀者都能接受的。而一個優秀的自然書寫者，往往會投入某些領域的專業知識內，反過頭來形成一種創作衝動，當投入的時間與精神足夠，自然就會形成「專業」（如劉克襄對古道的踏查，廖鴻基對鯨豚的理解，甚至到了可以跟國家申請研究計畫的專業程度）。我們回顧台灣的自然書寫史，幾乎沒有一位被文學史認可的自然書寫者，不是對自己寫作的對象有一種深刻的熱情的。因此，這當然可以視為一種寫作的門檻。但事實上，這卻也不是一種寫作的門檻（因為不會有人認為你不具專業就不能試圖創作自然筆記或自然文學），而是一種評論門檻。也就是，事實上是評論者常用這樣的標準來做為檢驗自然書寫者寫作成績的量尺之一。從這個問題延伸出去，另有一部分論者質疑為什麼過去我沒有將原住民書寫自然的作品納入自然書寫的討論，是不是太過輕視原住民「非專業性」地書寫自然？

以下我想再澄清關於我所謂的「知識」定義，以及我認為台灣當代自然書寫者，因為強化了追求非文學知識的熱情，才得以產生出有別於傳統自然文學的新美學表現、新倫理觀點。

我在2008年底發表的〈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文中已提醒讀者我所謂的「知識」，其實不僅是包括科學革命以來突飛猛進的生態知識、自然知識；還包括部落傳統知識中的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y knowledge, TEK）。⁷ 原因是這兩種知識都符合知識的定義：在某些經驗範圍內可驗證、可依循，並且可傳遞給另一人理解後，提供另一些人行為建議甚且成為行為準則。我在接觸了一些部落後漸漸發現，所謂傳統知識若能以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相互檢證，就可發現許多並非是純粹非理性的「禁忌」或「儀式」，而是一種積累的自然經驗，並且被系統化以後，變成可以教導後輩的話語，或者轉化為神話體系、口傳歷史的一部分。舉例而言，在文中我提出蘭嶼魚種知識與禁忌

7 這裡對「傳統生態知識」的定義，採用人類學者柏克斯（F. Berkes）的說法：「一個有關於生物間（包括人類）及生物與環境間關係的知識、實踐、信仰所組成之累積體系，並且經由一連串適應的過程以及文化延續進行世代傳承」。Berkes, F. *Sacred Ecology: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UK: Taylor and Francis, 1999.02), p.8

間的關聯，造舟樹種與植物知識的關聯，以說明禁忌其實可能是一種理性知識的行為模式。我在那篇文中寫道：「部分論者在提及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的生態智慧／知識時，或把科學知識視為邏輯的，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則是崇尚感受，立足於直覺。這樣的說法或許太過單純，太過絕對。前文已述，許多禁忌反而是來自於理性認知與經驗分析，並非純屬直覺。」⁸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假設學院中沒有田野調查經驗的學者，如果有機會和撒可努上山打獵，或和夏曼·藍波安一起上拼板舟捕飛魚，一定會被嘲弄為「沒有知識」（當然他們不會這麼說，在他們的語言裡，是「你不懂山」，是「海神記不得你的氣味」）。當他們進入山、進入海，最終將這些經驗化為文字之時，操持的難道全是「非知識」？純粹直覺？或僅是超越知識之外的超驗靈性而已？

至於像劉克襄、徐仁修等典型的自然書寫者，正如曾經訪台的自然文學研究者莫瑞（Thomas E. Moran）所說的：「分類學是自然寫作的重要精神」，他說「這二、三十年來成功的用漢語寫的自然寫作是台灣的自然寫作。而據我瞭解，很多台灣自然寫作並沒有從中國傳統哲學中吸收引分，並且，他們有些是具備科學素養的詩人和生態學者。」⁹知識在相關寫作中，並非傲慢、炫才的工具，而是盡量正確理解自然，從而提出自己思考或建議的「根本」。試想如果要保育黑面琵鷺，不理解牠們飛行的路徑、覓食的行為、會罹患的病症，那麼這種「關心」有意義嗎？若要談生存環境的改善，現代部落與自然環境的因應，如果不理解台灣的地質環境、部落文史，那麼豈不又落入傳統自然文學的浪漫懷想而已？也就是說，這批作者因為充滿熱情地投入另一種知識的探究以求解惑，終究使得他們的作品和傳統自然文學在美學、內涵表現上產生重大差異。

8 吳明益，〈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關於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所呈現環境倫理觀的初步思考〉，《中外文學》37卷4期（2008.12），頁146。

9 這段話收於莫瑞教授（Thomas E. Moran）在2007年參與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舉辦的講座中所發表的書面稿，「Green Mountains／青山——The Cultural Reordering of Nature／自然」一文，該文收錄在該會議的論文集內，但並沒有重排頁數。

我以為，各種類型的知識既是人類面對未來全球環境變遷議題下的重要養分，它並不會「妨礙」文學想像，在創作中善用科學語彙，對一流的作者而言，那是文學開疆闢土的工具。一個仍只是觸景傷情，寫物移情的作者，並無法開拓出新的美學典範，新的面對環境的倫理思維。

做為一種具行動力的書寫類型，無論寫作者提供的知識來自什麼樣的體系，都可能是解決問題的力量。科學知識意不在消滅傳統生態知識，與傳統生態知識也不處於對立面，而現在生態問題的複雜性，也不是文學研究者一廂情願認為的，可以在原住民的智慧中獲得解決，而地球上的七十多億人口也不可能全部再回到原住民的生活型態。正如近期仍發表新作討論氣候變遷的生態學家洛夫洛克所言，「一個人的心放對位置是不夠的」，還要有「清晰的思考。」¹⁰ 科學知識所誘引、導致的生態問題，終究還是需要更豐富、前衛、深入、細緻的知識才能處理。

澄清了上述兩點，此刻本文遂得以立了一個較清楚基礎上，去看待《以》書的不足，或如何拓展台灣相關研究的可能性。因為當時這兩點是針對現代自然書寫而下的界義，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時移既往，越界研究已成必然。

而為了越界，我們不得不先對邊界有些想像或說法。

二、越界是為了再發現：台灣生態批評的「欠缺」

文學的「定義」，向來是充滿變動性的。先別說人文學科和科學學科有其知識建構本質上的不同，即使連看似定論的生物學分類「界、門、綱、目、科、屬、種」，在研究的擴展過程中，都再衍生出總綱、亞綱、亞目等更細緻的分類，甚至從原先自然科學家所畫分的「動物、植物」二界擴充為五界。這意味著什麼？隨著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投入，不論是科學或人文學科，即使是根本性的原則也有調整的必要。研究必然是文本的後設，不同時期、觀察的角度

10 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金恒鑣譯，《蓋婭，大地之母（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4.08），頁8。

不同，這些後設所選定的視野都有調整的必要性。

問題是如何越界？越界的意義與趨勢為何？關於這點，或許在2009年來台的史洛維克教授（Scott Slovic）所講述的〈生態批評的三波浪潮〉（“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¹¹可以給我們啟示。

史洛維克綜合西方這幾年對生態批評的研究，分析西方的生態批評分成三波，第一波從1980年至今，重點在於非虛構的自然書寫（“nonfiction” nature writing）、聚焦於無人的荒野（Focus on non-human nature/wilderness）、聚焦於美國與英語系國家（American and British focus）、「對話式」的女性生態主義（“Discursive” ecofeminism）。第二波則從1990年代中期至今，特色有跨文類與綠色文化研究（Multiple genres and green culture studies）、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聚焦於世界各地的區域文學（Focus on local literatures around the world）、環境正義式的生態批評（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轉向都市與郊區（Urban and suburban）的環境議題等等。

從2000年延續至今的第三波生態批評特色，一是標示出「新生物地域主義」（neo-bioregionalism）的全球化概念，包括了「生態世界主義」（ecocosmopolitanism）、「根植本土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以及「全球視野」（the global soul），或「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特徵。其次是強調後國族（post-national）和後族裔（post-ethnic）的比較論者，第三是「唯物的」生態女性主義及多元化的性別研究（如生態男性主義，綠色酷兒理論）（“Material” ecofeminism and multiple gendered approaches（eco-masculinism, green queer theory））。最後則是出現多元、多元的行動主義者（Polymorphously activist）。

史洛維克的觀點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認為這三波並非一波取代另一

11 史洛維克教授的演講是2009年7月15、16日淡江大學英文系所舉辦「生態哲學與生態論述未來方向」工作坊中的一場。我個人沒有現場參加，書面資料與ppt則是由中山大學外文系周序樞教授所提供，在此致謝。

波，而是三波都具有時間的連續性，延續至今。但其中也並非全無疑義。

首先，這樣的觀點當然仍是以西方生態批評者的視野為中心。如果以台灣的狀況來看，「無人荒野」式的書寫只存在於殖民時期殖民國的「拓荒式」生態筆記，甚至可能全不存在。因為台灣除殖民時期外，不像美國始終有大量「無人居住的野地」，戰前或許尚有這類的地方，但僅出現在博物學家或探險家的筆記中。戰後台灣早已發展成人口密度極高的居住環境，因此在現代自然書寫出現之前，「無人的荒野」恐已不復存在。台灣七、八〇年代後探險式的作品，如徐仁修，探險的場域多半在海外。此外，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我認為無「人」所「觀察」到的自然或「荒野」從未存在於人們的「書寫」之中。即使是無人操作的鏡頭所拍攝到的畫面，最後也需要被人所「見」，才會被解讀，發生意義。即使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所描繪的人類未出現之前的世界，其實也都是科學家依靠證據與知識，再加以「想像」的。從這個觀點看來，地質史一面是一種科學敘事，也可以說是一種隱涵著文學性的敘事。更新世、第二紀、第三紀這些詞彙，意味著人所建構出來的地球創生史，即使那些歷史都沒有人類參與過。亦即是，我認為自然作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寫出「排除人的自然」。

其次，即使是自然書寫早期拓荒者劉克襄，他的第一本自然書寫《旅次札記》所寫的大肚河流域，也只能算是「郊區」，而韓韓、馬以工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也已經涉及環境正義的問題。這使得台灣第一批自然書寫的研究者如簡義明與我，所關心的議題都已經涉及第一、二波的生態批評範疇，甚且關注到第三波的全球化的問題，這是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使然。我們兩人都曾在論文中提到台灣環境問題的嚴重化，肇始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式入侵、毒物輸入。¹²這不代表我不認同史洛維克教授的看法，而是研究本有「在地性」的問題，史洛維克在美國觀察到的議題，未必全然呈現在此地的發展史。我關

12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第5章 生態殖民與宰制型社會〉，以及簡義明，〈臺灣「自然寫作」研究：以1981-1997為範圍·第2章〉（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

心的重點是，對此地的生態批評者而言，史洛維克提到的三波浪潮，其中有哪些是我們忽略的？而我們該如何「越界」，擺脫台灣學界這麼多年來始終在很有限的一批作者、文本中論述的研究困境？

（一）一種謹慎的越界：跨越傳統散文體自然書寫的研究

從文類來看，《以》書中討論的文本皆是「自然書寫中的非虛構散文」（nonfiction prose essay of nature writing），書中分析的是八〇年代後台灣這類作品與過去描寫自然作品截然不同的「新貌」，包括它生成的意義、類型、演化過程與代表作家。最後一章，我提到安邦斯特（Karla Armbruster）與華列士（Kathleen R. Wallace）《超越自然書寫》（*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2001）的意圖，即是越界、跨界研究的可能性。當然，這也同時意味了《以》書的「欠缺」。

派翠克·墨菲（Patrick Murphy）對自然書寫的擴大定義，或許可以看作是文學研究者對所謂「越界」的看法之一。墨菲在《自然導向文學研究的遠行》（*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2000）中，為了擴大自然書寫的定義，使用了「自然導向文學」（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一詞來包含涉及自然的書寫，將其再分列為「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環境書寫」（environmental writing）、「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4個領域。墨菲的意見是用「書寫」與「文學」分列，來切割不同文字表現模式的文本（將強調作者非虛構經驗的文本，與富虛構、想像性的文本分開），虛構文本稱為「○○文學」，另將強調記錄性、知識性，與自身非虛構經驗的散文體文本稱「○○書寫」。墨菲強調，這種研究上的分法並不發生於創作者的創作行為，而分類的種類也不是批評者評價時採用的「等級畫分」。墨菲的這個說法，意謂著研究「越出自然書寫」時，不會被研究者設下的定義所躓礙，將自然書寫的研究擴充到所謂「自然導向文學」的研究；而在解讀具想像力、虛構

性的文本時，也讓研究得以再次遠行。¹³ 這樣的分判其實突顯出相關議題的幾個焦點，其中很難解決的包括：虛構／非虛構該如何判斷？文學／非文學的判分依靠的是「虛構／非虛構」來判分，並不十分合理。

先擱置這類一時難以解答的爭議，無論如何，墨菲式的越界，啟示了「越界」的第一步，或許首先正是要越過「散文體自然書寫」的研究道路。在這些研究者筆下，除了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白鯨記》（*Moby-Dick*, 1850），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吉姆爺》（*Lord Jim*, 1900）這些明顯富涵自然與人之間地位與互動主題的作品外，包括凱塞（Willa Cather, 1875-1947）、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莫莉森（Toni Morrison, b.1931）、傑佛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哈波（Michael S. Harper, b.1938）的作品，都得以被納入討論文本，批評者試圖解讀出文本所隱涵的環境意識。簡單地說，相關議題的研究對象，已不再限於傳統自然書寫者如梭羅（Henry D. Thoreau, 1817-1862）、李奧波（Aldo Leopold, 1887-1943）或卡森女士（Rachel L. Carson, 1907-1964）的作品上。這類跨界研究最大的意義是：如果要呈現某個時代人與環境互動的複雜情境，那麼絕對不可能僅存在於典型性的自然書寫裡而已。許多虛構作品與詩，也會表現出人對環境的態度，以及人與環境互動的情境。

不過，這類越界的研究在台灣這幾年也不算多。以詩而言，2002年林子

13 Murphy, Patrick.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02), p.11. 該書中墨菲做了一個表格，來說明此四類書寫的一些內容，其中自然書寫具有「修辭性與敘述式」、「通常是非虛構」、「常是個人化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形式特質。它包括自然史散文、漫步與冥想、野地生活、旅行與冒險活動、農耕與牧地生活、自然哲思等內容。自然文學則是虛構、想像或富情節性的小說，常建立在個人經驗、歷史事件或自傳性的表述上，並會呈現多元觀點。在詩的方面包括自然詩、自然觀察、牧歌、農耕與牧地生活、輓歌、與動物互動等內容；小說則包括狩獵採集故事、動物故事與寓言、地方主義、野地生活、旅行與冒險活動、農耕與牧地生活、科學小說與奇幻小說等。環境書寫常具有爭議性與倫理學上的討論，通常也強調非虛構性，內容則包括環境剝削、社區激進主義、野地保護、農耕與牧地的可持續性、環境倫理等。環境文學則是具有虛構與想像性，情節轉化自主題，會呈現自我意識與倫理價值。在詩的方面包括觀察與危機、農耕價值、另類生活模式等主題，小說則包括環境危機與解決、野地保護、文化保護、烏托邦及反烏托邦、奇幻小說等內容與類型。這個分類包括的範疇很廣，有些概念則重疊，但確實解決了原先嚴格定義自然書寫的困境。在下文中，我對各種詞語的使用，基本上依循墨菲的概念。

弘的〈臺灣當代生態詩的萌芽與茁壯〉¹⁴是很重要的文獻，曾珍珍〈生態楊牧——析論生態意象在楊牧詩歌中的運用〉¹⁵則是具突破性的一篇論文，因為把過去絕少納入生態詩討論的楊牧納入了這類討論的範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2005年靜宜大學的「自然書寫研討會」中，阮美慧的〈從「現實」到「原鄉」——曾貴海詩中「鄉土情懷」的探索與追尋〉則是對長期專注寫生態詩作家的專論。不過這些論述的共同特色，仍以文學觀點出發，較少真正引述生態學的專門知識來與文本對話。至於討論的文本，我一直覺得忽視了除劉克襄外真正算是有野地經驗，詩人中的登山家鄭愁予早期寫的一系列「山岳詩」，¹⁶也很值得關注。這一方面顯示了台灣文學研究自然書寫相關議題時的「惰性」，也顯示學院研究者較缺乏其他可以援引來與文學對話的生態知識、自然經驗。

而在小說這個文類中，除了劉克襄的動物小說外，評論者也很少以其他台灣小說文本來討論其中所呈現的人與環境關係，或潛存的生態意識。我曾寫過兩篇論文：〈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笠山農場》中人們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與〈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湳村》到《廢墟臺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¹⁷其中曾以生態殖民（eco-colonialism）的觀點，配合台灣自然環境的研究史料重詮戰後台灣小說裡呈現的「環境變動」與未來想像。這樣的研究進路已非傳統的文學觀察，而較近於強調跨領域研究的「生態批評」。或許相當於史洛維克所說的第二波研究中的區域文學中，所呈現人的環境觀的探討。這類研究當可擴及台灣三〇與七〇年代兩波鄉土文學的文本，重構此地鄉土的觀看。在小說的研究上，我認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即是台灣科幻小說中生態意識的分析，這類文本雖然不多，且非台灣文學的主流，

14 林子弘，〈臺灣生態詩的萌芽與茁壯〉，《靜宜人文學報》17期（2002.12），頁31-52。

15 曾珍珍，〈生態楊牧——析論生態意象在楊牧詩歌中的運用〉，《中外文學》31卷8期（2003.01），頁161-191。

16 鄭愁予一系列的山岳詩可參考：鄭愁予，《鄭愁予詩集I》（台北：洪範書店，1979.09）。

17 吳明益，〈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笠山農場》中人們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亞太文學論壇」會議論文，《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高雄：台灣筆會，2004.12），頁89-111。〈環〉文則見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177-208。

但在國外的科幻作品往往寄寓人類對未來的想像，科學的期許，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態議題。不過目前台灣這類研究尚等待開拓。

此外，文學院中對科普寫作（science writing）的忽視，¹⁸ 一面來自於文學本位主義的盲點，一方面是文學院研究者不敢輕易臧否科普作品的良窳，這就涉即下一個批評者較為艱難的跨界，即是跨學科、跨文化的跨界批評。

（二）一種艱難的越界：跨學科、跨文化批評姿態的欠缺

一般而言，西方學者稱研究文學與環境關係，探討地景、生物、環境議題在文學中表現的學門為「生態批評」。也就是說，它是探討各種文本中，「人與非人間互動」（human-nonhuman interaction），或者，也可以說是人與生存環境（這個生存環境包括生物與無生物）的互動。

1992年成立的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 Environment, ASLE）顯然是相關研究者的一次學術界結盟。1996年格勞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與費洛姆（Harold Fromm）編輯了《生態批評讀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並與布伊爾（Lawrence Buell）編輯了《環境的想像》（*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這些重要的論述集，我們已經看到，若要研究文學與環境的關係，那將會是一張密如蛛網，相互涵攝的「論述網」：諸如「文學中的自然環境」、「自然環境與文學」、「自然環境如何影響文學」……簡直包羅萬象。格勞特費爾蒂當時寫道，所謂生態批評是「文學和自然環境關係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¹⁹ 這個說法日後被眾多學者討論、改寫，對「自然」、「生態」、「環境」等詞也有諸多不同的定義，但生態批評意謂著批評者在文學文本中，發現其所隱涵的環境意

18 關於台灣科普寫作的發展，可參考吳明益，〈傳遞知識是為了討論價值——試論臺灣科學／科普書寫中的幾個議題〉，「世界環境日（二）：『人文生態與生態科學對話』國際研討工作坊」論文（生態關懷者協會、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2009.06）

19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05), p.18.

識、環境倫理的相關看法，大致不錯。史考特·史洛維克（Scott Slovic）和喬治·哈特（George Hart）2004年所編的《文學與環境》（*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在序言中寫到這麼一段話：「雖然北美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們，總是關注人類和山水風景、植物及動物之間的互動情形，但是文學家和藝術學科、人文學科的學者專家們（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歷史、哲學等相關學科），在傳統上會將他們的研究議題放在人類的表現和人類的經驗上，而很少去思考人類行為與這個星球的錯綜複雜關係，也很少思考人類經驗對『自然』的衝擊。」²⁰ 這樣的批評顯然切中核心。說明了不論是美國或台灣的人文研究者，很難真正獲得「跨」學科的尊敬，也因此，謹慎的學者也不會貿然暴露自己知識的不足，援引太多人文本行以外的資料。但事實上，生態批評意謂著結合地理、自然科學、生態學、文學等學門的批評門徑，其研究範疇甚至擴及其它非文學（如建築、電影……）場域，因此，我們不妨將這個層次的跨越視為現代自然書寫這種文學類型，對批評家的「挑戰」。

越界第二層次的意義，即是越過「文學中心主義」的觀察點。生態學在近年受到重視，日漸發達，並逐漸影響政治決策、社會觀感、倫理信仰，漸次形成一種典範交替的趨勢之時，意味著此一學門在這個時代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並且改變了人類對環境的觀感與思考深度。而這些新的思考路向，讓文學研究者，有機會在審閱文本時，發現過去所未發現過的新意義。如果我們藉此視野，重新展望，當可發現島嶼的文學與藝術，凡涉及人與非人環境互動的書寫與表現，都透露、暗示、隱喻了此地的「生態／自然／環境文化」。

這個層次的越界，文學研究者與科學學門中的自然科學所拓展出的新視野結盟，遂得以在「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批評門徑裡，徘徊許久的人文學者，找到全新的視野（但也面臨全新的挑戰）。

與人文學科最接近的，當是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相關

20 Scott Slovic & George Hart,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4.07), p.1.

議題。人和環境之間，存在著一種因時而異的環境倫理觀（environmental ethics），²¹ 這些倫理觀從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光譜的資源保育（Resource Conservation）。較趨近「反人類中心主義」（anti-anthropocentrism）的有荒野保存（Wilderness Preservation）、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或生物中心主義（biocentrism）、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以及土地倫理（Land Ethics）等各種立場，這些立場反映出了不同人類文化、地域、思維方式對待環境的態度與價值判斷。這在過去沒有被視為是倫理學門中的議題，已變得愈來愈重要，也是人文學者最易「跨越」的一種批評門徑。

從人類學角度來看，部分學者重新發現了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意義，並且重提各地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TEK）的重要性，於是，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成了新的詮釋語彙。這使得不但各地原住民作家的作品重獲重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深入原住民文化的傳說、神話傳統、文化背景中，才能更深刻地解讀這些原住民作品中的環境觀。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研究不乏其人，但真正能使用原住民的在地生態知識與其對話者屈指可數。田野經驗、語言能力的欠缺，使得學者只能正面附和原住民文學中的一些觀點，而無法開啟對話，實在可惜。相對的，優秀的原住民作家卻相對努力「離開」母文化的堡壘，如2008年夏曼·藍波安獲聘為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接觸到科學對海洋的研究模式，勢必對他下一階段的書寫產生具體的影響。但未來能否有具備科學與達悟民族學海洋知識的文學論述者足堪與之對話？

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看，女性的生理、自然天賦與在文化、政治、社會上的被宰制會不會有一種連動關係？女性看待自然，會不會和男性有先天或後天上的異質？生態女性主義（ecological feminism）試著解釋這些觀點以及

21 關於環境倫理的相關問題，可參考羅斯頓（Holmes Rolston III）著，王瑞香譯，《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其背後的性別宰制。正如葛莉塔·尅德（Greta Gaard）所言：「女性與被壓迫的窮人、勞動階級、非人類動物、未開化的自然，全都被工業化、技術化的『已開化』的男性壓迫。」²² 因此，女性與被剝削的自然、動物面臨同一處境，而要揭露這種壓迫，研究者顯然也要透過生態學或生物學等知識的「蔽障」，方能透澈。台灣目前以生態女性主義做為研究門徑的作者，多半仍以作者性別為考慮的擇選對象（皆僅聚焦在洪素麗、凌拂等作家身上）。但誰又說未來不會出現一位既對動物行為中的性／別行為有研究，並能重新思考人類男女、男男、女女……性別關係的學者呢？而以「女農」的角色進行農業書寫的阿寶，難道在書寫中沒有蘊涵某種超越性別的行動啟示了我們？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所謂歷史真是從屬於人類的歷史？其它生物難道就沒有一種生物史？地球難道沒有形成地球史？當這些生物、地貌的時間變遷觀點加入後，環境史學（environmental history）遂提供了一種過去忽視的史觀。它不但發現人類發展的環境因素，甚或深度批判了人類在移民／殖民過程，是否已發展出一種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²³ 從而變成了一種生態殖民（eco-colonialism）的行為？殖民者在一地進行掠奪式或剝削性的生態調查與開採、破壞，原住民的自然觀與自然知識過去常受主流社會的忽視，從後殖民論述角度進行批判這樣的現象，遂成為後殖民生態學（postcolonial ecologies）。台灣原住民文學中對漢人進入後自然環境的變遷描寫、自然語彙的喪失，或可以這種角度去切入觀察，當會有不一樣的發現。環境史學其實不只是一種史學角度，也是一種地理學角度，重點在於歷史的舞

22 Greta Gaard, CHAPTER I: "Living Interconnections with Animals and Nature",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01), p.1

23 一般論及殖民文化，總是從政治上的宰制、經濟上的剝削，以及文化上的霸權著眼，來說明被殖民者「失語」與「失憶」的認同危機。但環境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則認為，有一種侵略工具更具有隱性的造化力量，即是從生態環境上改變被殖民地。克羅斯比認為，歐洲從15世紀開始的擴張史、帝國主義侵略史、殖民史即是一部「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史。歐洲人隨身帶著蓄養的動物、微生物與病原體、植物等等生物，使他們同時改變了「新發現」地的生態與人文風貌。天花等病菌使缺乏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人口銳減，是西班牙、英國等強權能在當地原住民薄弱的抵抗下得以迅速入侵的核心因素。Crosby, Alfred W.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nto ed. 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07), p.220-222.

台上加入了「非人的自然界」。這是一個開啟當代歷史學、地理學與文學合作契機的門徑，文本中心解釋的時代重被挑戰，對文本背景，文本內所描寫時間、空間環境解讀能力，將影響論述的深度。

而從離人文學科最遠的科學研究（這裡的科學研究專指物理、生物科學，而不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角度出發，達爾文演化論的說法漸次深入、分歧，從天擇到性擇，從動物行為學到基因論，各家說法爭鳴。科學家拓展他們的思考領域，開始和宗教、社會學、歷史學，甚至是人性論、文學對話。雖然爭議頗大，認為人類社會行為多半能在生物性上找到根源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可說是很具特色的代表學派，他們以科學研究生物行為，並且轉以運用到解釋人類社會的運作上。社會生物學者多半熟稔生態學、基因學、生物學……，以致於像威爾森（Edward O. Wilson）這類學者，能從人類對蛇的恐懼，談到心理學上的「有備學習」（prepared learning），再從演化學上，舉證黑猩猩和人類同樣對蛇存有極度的恐懼，復繞到埃及、阿茲特克……等神話，來論及這樣的恐懼如何變成一種文化與藝術表現。因此，當威爾森說：「巨蛇形象在心靈和文化上的重要性，超越了自然界的蛇類。我們可以把了解『牠如何由地上的爬蟲類轉變而來』的過程，視為通過科學和人文邊界地帶的多種途徑之一。」時，²⁴ 充滿魅力。雖然他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1975）、《論人性》（*On Human Nature*, 1978）等著作備受爭議，但卻被認為是當代跨越科學與人文學的重要著作，並兩度獲普立茲獎，這說明了，他同時也被認可是一位優秀的科普作家與自然作家。可以想見，一個具備某些科學知識的批評者，可能較有能力解析出自然書寫者在文本中暗藏的密碼，也較能援引更新的科學研究來討論文本，避免陷入主觀想像的困局中。

而在文本上，除了文學文本以外，電影、建築、數位藝術……中，均有愈來愈多涉及環境議題的表現，因此除了生物學、生態學外，研究者甚至還應

24 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梁錦鑿譯，《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03），頁2002:118-9。

涉獵影像論述、建築學、都市學、數位理論……否則怎能更準確地解讀原意？

可以這麼說，從典型的現代自然書寫研究的基礎往外望去，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文學或非文學作品中，仍有許多可供觀察此地環境意識轉移的文本，往虛構文學（詩、小說）越界探索，到與其他學門研究跨界合作，這都是為了再發現過去沒注意到的文本，或沒注意到的文本中的寓意，從而更深刻地理解此間文化所呈現出的環境意識，所構造出的環境經驗。一旦評論者具有這樣複眼式的觀察、批評視野後，才可能做到全球視野，或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評論。畢竟，生態的問題是「物物相關」，並非一時一地的局部觀察就可完整解釋。

但對批評者來說，這樣的跨界誠屬不易，卻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因為在思維跨界後，視野隨之改變，過去的觀察也會隨之異動。我認為，創作者在創作時的越界，從文學表現上來觀察是一種美學的開拓，而批評者在解讀時對自己專業知識的越界則是對創作者的回應，以及尋找新視野做為切入批評的重要行動。

三、戀土、覺醒、追尋與棲居

從以上的觀點回頭檢視我自己過去對台灣自然書寫20年發展的鳥瞰式分期，當有不同的解釋。我曾將1980至2000年代左右，分為幾個階段，分別是1.「聽到土地的呼聲（1980-1985）」（環境議題報導的出現、自然書寫／文學的先行者出現、簡樸生活文學的出現），2.「逐步演化出多樣性（1986-1995）」（生態資料的深度爬梳、環境議題報導的延續、自然史的鑽研、荒野價值的再發現、環境倫理的深層思考、城市與荒野相容的可能性、社區環境意識的深化）。3.「建立新倫理的摸索（1995-2000）」（區域生態圈觀察的書寫、女性自然書寫的再深化、從求生走向護生）。²⁵

這樣的分期方式和一般文學史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參考同一時期社會上

25 吳明益，〈對話的歷史：台灣現代書寫二十年來（1980-2002）的演化概念〉，《以書寫解放自然》，頁195-216。

發生的重要環境運動事件，再加上該時期具有成就或特殊的出版物來確認時間座標，與轉變的特色，來觀察書寫與出版市場的變化。但缺點就是沒有做到文類的跨界觀察，且忽視了一些非文學出發的作品（即使所謂「自然導向文學」的觀察視野）。除此之外，該書的第四章描述了台灣自然寫作「前史」，討論了西方與日本探險家、博物學家，中國官員、地方誌書寫等作品中的「自然」，並在第五章分析現代自然書寫出現的因緣，以及自然書寫和鄉土文學的關係，定名為「對土地與共同記憶的認同」。這是我認為自然書寫和鄉土文學是一種平行的關係，兩者都出自對土地的善意，而差異則在於前者沒有走上「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對立（或詰辯）中」。²⁶但我當時並未對鄉土文學時期的文本進行較深刻的評論，雖然日後針對宋澤萊的作品進行過闡釋，但仍有很大的解釋空隙存在。

本文因篇幅受限（其實只是我尚未完成的一部著作中的一篇文章），無法在此進行對鄉土文學的全面再詮釋，但可以發現的一個觀察點是，鄉土文學與早期自然書寫中的簡樸生活文學（如陳冠學、孟東籬），都和鄉土文學一樣對未污染，未發展成高度資本主義的「舊世界」、「舊土地」充滿依戀，而具有某種戀土情結的呈現。這是除去博物學家、探險家的「他者書寫」後，台灣文學中涉及人與環境關係的第一種情境。

八〇年代後，台灣自然導向文學變得愈加蓬勃，無論是隱逸、田園、簡樸生活式的寫作，或是環境書寫（韓韓、馬以工、心岱等等），或是兼容觀察與批判色彩的自然書寫（劉克襄、徐仁修等等），都可以視為是對當時環境崩毀的一種覺醒，並且以書寫進行抵抗。彼時政府政策趕不上環境崩壞的速度，因此這三種對應的姿態都呈現一種不安的氛圍。陳冠學說：「在資本財閥統治的國度，農人早已失去了土地，被收攏入工廠。」²⁷馬以工開始提出環境公共財的概念，認為「這樣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說：工廠沒有權利為了

26 同註25，頁178-179。

27 陳冠學，〈晚秋篇·11月25日〉，《田園之秋》（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4.11），頁327。

『自己的』經濟算盤把毒氣放出在『我們公有的』大氣之中。」²⁸而劉克襄也透過自然觀察，說：「保護區？好名詞，所有的動植物都該有，未來某一天，人也需要的。」²⁹這時期的作品往往有一種覺醒後悲壯對抗的激烈情緒，但對實際的環境想像則較缺乏。

八〇年代末期，民間的環境運動開始蓬勃。1985年之前多半只是個別議題的「公害事件」，並沒有成為民眾聚焦的關注點。1985年6月，台中縣大里鄉反對三晃農藥廠污染的鄉民，以闖入工廠的直接抗議行動，揭開了台灣地方住民反公害「自力救濟」運動的序幕；並且在1986年4月成立了台灣第一個民間反公害團體——「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這一連串過程當時重要的報導雜誌《人間》也做出報導。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社會事件會觸動公民意識，自此而後，環境運動漸漸被輿論和地方社群接受。再加上NGO的環境團體逐漸成立，九〇年代開始環境意識至少已成為整個社會皆能接受的「正面價值」。這時政府在推動任何有關環境的重大建設時，已不再像過去採獨斷速裁的方式，或與民間處於絕對對立的立場。不過政府仍是這些重大工程的推動者，只是從以往的行政獨裁，轉為較柔性的政策說服者，而民間也蓄積了較充足的力量與行政機器對抗。基本上，寫作者在觀念上的對抗似乎比社會運動更早些，也更前衛些。

而當環境運動的對抗態勢成立後，九〇年代開始，相關書寫則轉入一種較接近於「追尋」的姿態。就較長期經營的個別作家創作而言，他們一面追尋「可能解決此地環境問題的途徑」，一面追尋「心靈中環境意識的深層對話」。劉克襄一面寫作《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1989），一面尋訪西方與日本探險者的足跡。在這樣的田野與案牘的交替搜尋中，劉克襄在下一階段才走出既深入淺出，又廣博至人文史、地方史、自然史交錯的導覽與行旅姿態。而森林學者出身的陳玉峰，一面帶領環境運動，一面積極建立「此地的土地倫

28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台北：九歌出版社，1983.04），頁39。

29 劉克襄，〈大甲鷺鸞保護區〉，《旅次札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82.06），頁108。

理」，在書寫雖毫不遲疑針對時弊，但相對我認為以「后土」、「生境」、「隔代教育」為基調的倫理思考，一定也是陳玉峰在心靈與意識上反覆衝撞後才提出的意見，雖然他在日後放棄了文學書寫，但這個結果也賦予了那段「追尋」歲月深沉的意義。另外以海洋為書寫對象的作家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前者在歷經「討海人、尋鯨人、護鯨人」的思維轉變過程中，反覆詰問自己，不斷尋找自己轉變中的環境價值，終成就為台灣海洋文學的代表人物，透過黑潮文化基金會的成立，對當前的海洋文化發展更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力。夏曼·藍波安「離、返」族群身份的追尋之旅一直是他書寫的主調，這樣的追尋或許永無止盡，但我認為2008年他獲聘為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後，接觸到科學對海洋的研究模式，勢必對他下一階段的書寫產生具體的影響。這樣的追尋通常在「覺醒、抵抗」的姿態確立後才出現，對寫作者而言往往是一條漫漫的自我追尋歷程。

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生態旅遊」(ecotourism)的興起或許可以視為一個觀察指標。18、19世紀博物學者的旅行，觀察者的觀察旅程，或可稱為素樸的生態旅行。但在1983年西方提出生態旅遊這樣的名詞時，指涉的是一種負責任的旅行，顧及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當然，同時也涉及了商業行為。生態旅遊的形成與自然導覽手冊的普遍化有密切相關，生態觀察、旅行蓬勃後，此地作者自行編寫的導覽手冊才逐漸出現。雖然過去並非沒有圖鑑出版，但以往這些出版品的出版者通常是農委會、國家公園等政府單位，或不易在書市中購買到，而版面與版本的設計也不利一般民眾的攜帶與閱讀。劉克襄在〈九〇年代台灣生態旅遊指南的趨勢〉中將自然導覽的發展分為3個時期，第一時期由1990年至1994年左右，第二時期則以1995年為主，晚期則是從1997年開始。³⁰第二時期正是生態旅遊深化的開始。導覽手冊、田野觀察出版的蓬勃，順勢帶動了科普寫作進入主流市場。

由於人與自然的互動模式在生態旅遊後產生了質變，過去以「依靠土地

30 劉克襄，〈九〇年代台灣生態旅遊指南的趨勢〉，「淡江大學國際生態論述會議」論文（淡江大學英文系主辦，2000.10）。

生活」的認識方式，現在變成「嗜好與閒暇活動」的認識方式。我認為，這個時期的出現，更應該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環境倫理關係，否則勢將把人與自然的關係帶入另一層次消費自然的文化。過去以不顧自然的崩毀而強調發展所造成的傷害，今後可能會轉變為將自然視為消費對象的另一種「消費者與被消費者」的宰制。

2000年以後，我認為主要觀察的有三種現象。第一是「專業化、細膩化、分眾化的科普寫作已出現。這可以從幾個觀察點來確認：一、本地作者所創作的手繪圖鑑漸漸出現，這意味著高成本的出版在台灣已不成問題。³¹二、業餘觀察者「分眾化」、「深入化」的趨勢已逐漸形成。如在過去鞘翅目下的天牛科昆蟲通常只是《昆蟲圖鑑》中的幾頁而已，現在顯然市場已經需要更準確、完整的天牛專屬圖鑑，於是周文一的《台灣天牛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07）才有了出版空間。又比方說像祁偉廉的《鳥羽》（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02）這樣以展示各種鳥類羽毛的圖鑑，則是在各類型「鳥類圖鑑」接近完備之後，才會出現需求的特殊圖鑑類型。除此之外，最後一個現象，則是專業的科學家投入科普寫作。

與過去台灣科普著作多為翻譯的狀況不同，在近幾年間，台灣本地科普著作的出版亦已漸漸增多且趨向優質化。舉例而言，2003年《黑熊手記》出版，帶著國外學歷、一身科學知識回到玉山調查台灣黑熊的黃美秀，在書中寫出自己面對原住民傳統知識後有了態度上的調整，原住民對黑熊的了解顯示出他們長期的生存智慧³²和獨特的觀點，讓黃美秀「發現自己的邏輯和這近十年來所受的科學訓練，在這片依自然法則運作下的叢林，以及非科學、

31 一般來說，手繪圖鑑要比攝影圖鑑來得費時費工，因為手繪就需要大量的生態攝影照片輔助。此外，出版社的版權費付出，手繪圖一般也要比攝影圖來得更昂貴，一張顏色、細部均準確的手繪圖，版權費往往極高。最近台灣的手繪圖鑑，個人認為最精緻且具有代表性的為資深賞鳥人蔡錦文所繪著的《雁鴨》（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10）。

32 黃美秀，《黑熊手記》（台北：商周出版社，2002.12），頁29：「直到山陰（20K），我終於看到傳說中的「熊窩」。部落訪查時，原住民告訴我：黑熊會在地面上折芒草作巢。我有點不相信，因為我所閱覽過有關亞洲或美洲黑熊的各種文獻，都沒有這種報導。」

非主流範疇的大哥面前，正受著嚴苛的挑戰與考驗。」³³於是她開始接受布農人「夢兆」的說法，並尊重布農人眼中的自然（Dihanin）與萬物精靈（Hanidu）。在手記中，黃美秀藉由科學與傳統知識，女性科學家角色與孤獨研究者角色的衝突、協調，寫出一本「人」在做研究的手記，而非是科學家的「研究報告」。於是黃美秀說「與其說是在『追熊』，其實不也是在尋找自己嗎？」³⁴確然，尋找自己，其實是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也同時進行的事，重新定位自己和環境與被研究者的關係，黃美秀發現，即使是將黑熊視為靈獸的原住民，也不可避免和黑熊有生存區位爭奪上的衝突，最後她是這麼定位自己與黑熊之間的關係：

一如其他人，我也喜歡目睹野外黑熊的風采，但更希望牠們能保持本能上對人的幾分畏懼，一如我對牠們的敬畏一般，這樣營造出來的距離既是自然，對彼此也都有好處。³⁵

這是一種既不以人類中心主義思考的模式，又體認無法擺脫人類中心思考的限制的「自我設限」，黑熊的角色已不是被研究者、保護者，而是和黃美秀一樣在玉山生存的生靈的一種而已。

而台大昆蟲系名譽教授朱耀沂博士除了出版《台灣昆蟲學史話》這部巨作，也寫了一系列給一般讀者閱讀的昆蟲生態相關作品，³⁶這些著作不再冷僻艱深，而往往是在介紹生態的同時，也潛藏了一些更成熟的環境倫理觀，這些倫理觀來自對科學的了解，而不是純粹的「溫情主義」，而且對一般讀者而言，這類型著作的影響力往往比冷冰冰的學術論著更大。2006年，資深的植物學家、昆蟲學家李淳陽改寫自己一生的昆蟲觀察出版了《李淳陽昆蟲記》，這不但是一本通俗的生態觀察記錄，在昆蟲學上的成就也受學界肯定。正如

33 同註32，頁15。

34 同註32，頁113。

35 同註32，頁177。

36 如其於2005年在玉山社出版的《昆蟲聊天室》、《昆蟲雜貨店》、《黑道昆蟲記》、《午茶昆蟲學》等一系列作品，都是既專業又能為一般讀者接受的著作。

《昆蟲知己李淳陽》一書裡引到《李淳陽記事》影片裡的一段話，這些作者都是「將科學藝術化的實踐家」。³⁷

除了自然與科普書寫發展以外，「簡樸生活文學」的進一步發展也很值得關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陳、孟等人的簡樸生活文學，曾展示了一種「自願貧窮式」的生活型態，而打動了無數讀者。在他們的行文中，不但沒有「怨貧」、「苦貧」的懊惱，反而表達出心靈上的自適與安慰。雖然在基本態度上，2004年阿寶出版的《女農討山誌》看來與陳、孟兩人差不多，但在做法上卻有很大差異。阿寶不但承繼了這類型書寫的「思考姿態」，更進一步以實際行動對抗台灣環境的惡化。她以女性的身分獨立「討山」，對舉債、農事學習、收穫、出售……等等過程進行詳實的記錄，進而探討台灣高海拔山區的開發問題。阿寶認為：「一生中要有一段日子，流汗低頭向土地索食，生命的過程才算完整。」³⁸除開某種「理想」的深化，在《女》書中阿寶也記錄鳥種，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寫出她耕種過程中不斷嘗試尋找比較不讓吃果樹的昆蟲痛苦死亡的「對抗」方式，讀來令人動容。應該說，阿寶不只有「理念」，還有「知識」，這種寫作姿態使得簡樸生活文學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不只是感性抒發，而是理性思辯再加上知識輔助後對環境的理解；不是一種「閒適」的姿態，而是面對環境崩壞的積極建議。「更具說服力的簡樸生活」其實和近年民眾所重視的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相關，這種「改善生活」品質的新農業形態，對治的是綠色革命以來，強調生產力，而以大量化肥、農藥建構的市場機制。要解讀這類作品，我認為除了對農業發展的理解之外，也應涉獵現今環運界積極推動的素食主義背後的理由，以及全球貿易與農業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因此，或許將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2007）和阿寶的《女》合併觀察，可以建構一種新世代的農業觀，而農業所面對的正是此地環境的根本——土地。

而另一種以改善生活品質為顯性目標的書寫則是對「生態城市」、「生

37 莊展鵬，《昆蟲知己李淳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5.03），頁306。

38 阿寶，《女農討山誌》（台北：張老師出版社，2004.02），頁29。

態建築」進行探索、討論、實踐的作品。生態城市、建築所推動或展現節能、低耗的生活型態，已成為一種既有理念又有做法的新姿態，這遠比鼓勵人們放棄都市生活隱居要有效且合理得多。這類作品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早年曾報導過核電問題³⁹的胡湘玲所寫的一系列關於自立造屋的作品：《到天涯的盡頭蓋房子》（2004，野人出版社）、《不只是蓋房子：玩泥巴拌木屑的汗水假期》（2004，野人出版社）。前者記錄了3位台灣女子到俄國幫車諾比核電廠災民蓋房子的經過，後者則記錄了透過mail，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為921布農族受災戶蓋房子的經過。野人出版社主編在為這本書寫序時提及在新書發表會現場，胡湘玲表示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為了反核、搞社會運動、對抗資本主義。」更可以看出，這類作品其實不僅僅談「建築」，深層談的也是一種對所居社會的期許、理想，一個棲居此地的夢。而由於學術的專業和新的經驗，2006年開始胡湘玲轉向撰寫使用太陽能的社區與房子，並出版了《太陽房子》（2006），《太陽能源》（2009）兩書，以向台灣的讀者介紹德國的太陽能社區、建築、技術與法令規章。這些作品不但不難讀，同時兼具知識性和對居住文化的概念，他在《太陽房子》一書的第一頁引用了德國左派兒童作家埃利希·克斯特納（Erich Kästner, 1899-1974）的一句話：「從來沒有好事情，除非有人做了好事情。」⁴⁰我認為最能表現胡湘玲藉「房子」表現對人類棲居與島嶼未來期許的意圖。

除了胡湘玲外，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的林黛羚所撰寫的《蓋自己的房子》（2007）、《做自己的建築師：蓋綠色的房子》（2009）近年也受到市場注目，她寫的是在地化的綠房子，與胡湘玲的德國經驗恰好可形成一個有趣的比較。

2000年後台灣自然導向文學的發展，除了傳統的散文體自然書寫以外，上個世紀以戀土情結（諸如鄉土文學時期的部分小說作品）、環境預言書（諸如科幻小說）或對環境的反抗為主調的小說與環境詩均尚未看到進一步的演

39 胡湘玲，《核工專家VS.反核專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07）。

40 胡湘玲，《太陽房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6.07），扉頁。

化。但如果擴及非傳統純文學的作品來看，則顯出書寫者的投入已更深入、層面也更加廣泛。無論是科普作品的普及與分眾化，或是簡樸生活文學與農業書寫更具獨立意識，這些作者正在以他們的專業或興趣在為我們建構可能的、更美好的棲居。而原本自然書寫領域的作者，包括劉克襄、廖鴻基等人，新作都呈現出對文學本質的要求，並且持續擴大自身的關懷領域，而這樣的關懷，其實正是一種對自身居住地的重新檢視。（劉克襄的小鎮書寫，廖鴻基、夏曼·藍波安投入海洋研究，我個人從蝶類書寫轉向水環境的關注……）

這樣的傾向意味著什麼？我以為，這些作品，不論是顯性改善生存環境（有機農業、園藝；生態城市、建築），或是隱性改善生存品質（生態旅行、圖鑑；結合文學與科學的實踐）的書寫，都意謂著台灣的相關書寫已顯現出一種新潮流，那就是如何讓我們棲居的島嶼變得更適宜人居，而在危機如此普遍化之前，我們很長一段時機以為棲居是不用遠大眼光，對未來想像的，以致於出現了一個人造風景毀害自然風景，人造建築毀滅自然地景的時代。而在漫長的追尋後，各類型作者將他們的專業、經驗，與想像結合，既觀察這個島嶼，也期許這個島嶼，重新成為適合人居之處。

四、結語：環境對書寫的挑戰

我遠遠看到地球，它像一滴泫然欲滴的眼淚，發著藍色的光，我從不知道它這麼美麗。

阿姆斯特壯第一次登陸月球時，從太空中傳回NASA的對話。

這篇文章從對現代散文體自然書寫的「非虛構」與「知識性」特徵談起，澄清這兩個觀察點對評價相關文本的重要性，接著論述台灣環境與文學研究第二階段應嘗試的「越界」，並重新鳥瞰式地定位這三十年來台灣自然導向文學的階段性發展，從一開始的戀土，到覺醒、抵抗，而後追尋與摸索，終至新世紀開始的棲居想像。這樣的轉變當然不是整齊劃一的，以10年為一斷代的轉變。其中涉及環境運動、社會變局、知識導入等複雜歷程，以簡單的時序

分期，就像是在野外設立觀察的時間點是一樣的，可能危險、粗糙，卻不得不然。那只不過是一種比較的基準，視域的界定。

而我一直認為，無論是論述或創作，文學與環境的關係不該是靜態的。創作者與論述者都應接觸自然，甚至積極投入對棲居世界的改變。也就是史洛維克所說的「多元的行動主義者（Polymorphously activist）」¹。這也就代表了我回應部分論文對此類文本太過「專業」的質疑：沒有門檻，何來優秀的作品？而沒有實際行動投入，案牘研究此類文本，又有何用？

這幾年國內生態批評蓬勃，生態論述似乎一時之間成為此地文學學門的顯學。但以人文學門來說，國內投入生態論述的學者，雖然有不少文筆犀利，理論清楚的人才，卻多數缺乏行動力，極少有學者長時間投入環境運動，或自己就是生態觀察家。國外的生態批評學者如史洛維克、艾爾德（John Elder）、梅貝（Richard Maybe），本身亦多少涉及創作，同時都是實踐型的生態觀察者。生態關懷者協會曾邀請美國環境倫理學重要學者羅斯頓（Holmes Rolston）來台，透過協會的朋友轉述，以及個人接觸發現，他原來是一位幾近專業的蕨類觀察家。其中有一個參訪行程是熟稔野外的志工帶他到烏來山上導覽，他對每一種蕨類都深感興趣，並非常認真地把觀察的種類筆記起來，專業知識令志工折服。我始終以為，野外經驗是研究此一學門的基本修養，也是持續熱情的良方。紙上論述是人們探討環境與文學的重要過程，但如果達爾文未曾搭小獵犬號出海，威爾森不曾執行「小島計畫」，馬克吐溫不曾是密西西比河的領航員，或者，羅斯頓只是在書房中探討倫理的學究，這門新行當，會不會失去閃現的「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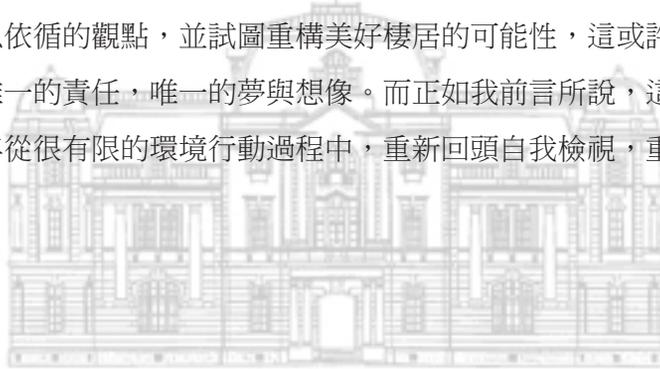
而更有甚者，在面對全球化的環境危機時，這些學者都不吝發聲，或投入社會運動。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這麼一個即將失去令人泫然欲泣美麗星球的時代。

我手邊一本2008年格溫·戴爾（Gwynne Dyer）的新書《氣候戰爭》（*Climate Wars*, 2009年底剛譯出），已經用「戰爭」這樣激烈字眼來形容我們面對的氣候變局。環境與文學的研究不該是學院裡獲取學位，爭取研究計畫的工具，而是促成更多人關心此一議題，並做出明確、適當抉擇的催化劑。因

此研究者當對自己已有高度期許，實際接觸、投入運動、促成改變，和創作者構成一種訴說的力量。這是環境對書寫者的挑戰，當然也可以說是書寫對環境的挑戰。

從《以》書之後，我停止撰寫相關論文達4年之久，這段時間除以創作來做為一種質問自己的姿態，一面也希望能有一天重拾對此議題的關注，並且跨入第二階段的研究。這兩年我從建構台灣的「河流書寫」，到反省原住民書寫自然時所呈現的「傳統生態知識」中的理性思維，到解讀鍾理和、宋澤萊等「鄉土」作者小說裡潛存的生態意識，分析台灣科普作品的出版特色，並透過研究劉大任的園林書寫來擴大自然書寫的邊界。⁴¹ 未來我準備再討論自然書寫者手繪地圖的空間意識、台灣飲食文學中的生態觀，並在未來一年於中興大學人社中心的短期研究，提出〈無法獨立的「水意識」：台灣文學筆下的河流、濕地與大海〉的計畫案。我同時參與一些生態團體，持續保持固定野外踏查的習慣，雖然仍顯膚淺，但確實試圖朝本文所批判的「不足」的方向走去。

三十年來，台灣的自然導向文學以書寫喚起覺醒、抵抗傾圮、絕望與傷害，追尋可以依循的觀點，並試圖重構美好棲居的可能性，這或許是執筆者的唯一能力，唯一的責任，唯一的夢與想像。而正如我前言所說，這篇文章，也正是我這幾年從很有限的環境行動過程中，重新回頭自我檢視，重新展開論述的一枚基石。



41 吳明益，〈傳遞知識是為了討論價值：談臺灣科學/科普書寫中的幾個議題〉「世界地球日（二）」『人文生態與科學生態對話』國際工作坊」論文。後者見吳明益，〈造心景，抑或安天命？論劉大任《園林內外》中的園林觀與書寫特質〉，《台灣文學學報》15期（2009.12），頁199-232。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朱耀沂，《臺灣昆蟲學史話》（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
-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11）。
-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7.08）。
- 阿寶，《女農討山誌》（台北：張老師出版社，2004.02）。
- 周文一，《台灣天牛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07）。
- 祁偉廉，《鳥羽》（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02）。
- 胡湘玲，《核工專家VS.反核專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07）。
- 《太陽房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6.07）。
- 莊展鵬，《昆蟲知己李淳陽》（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5.03）。
- 陳冠學，《田園之秋》（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4.11）。
- 黃美秀，《黑熊手記》（台北：商周出版社，2002.12）。
- 蔡錦文，《雁鴨》（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10）。
-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台北：九歌出版社，1983.04）。
- 鄭愁予，《鄭愁予詩集I》（台北：洪範書店，1979.09）。
- 劉克襄，《旅次札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82）。
-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李桂蜜譯，《為什麼讀經典（*Perche Leggere I Classici*）》（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5.08）。
- 艾可（Umberto Eco）著，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0.11）。
- 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金恒鑣譯，《蓋婭，大地之母（*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4.08）。
- 戴爾（Gwynne Dyer）著，林聰毅譯，《氣候戰爭（*Climate Wars*）》（台北：財信出版，2009）。
- 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梁錦鑒譯，《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03）。
- 羅斯頓（Rolston III, Holmes）著，王瑞香譯，《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Environment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Armbruster, Karla and Wallace, Kathleen R. (ed.) "Introduction: Why Go Beyond Nature Writing, and Where To?" , *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1.05)

Berkes, F. *Sacred Ecology: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UK: Taylor and Francis, 1999.02)

Crosby, Alfred W.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07)

Glotfelty, Cheryll & Fromm, Harold.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05)

Greta Gaard, "CHAPTER I: Living Interconnections with Animals and Nature" ,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Kerridge, Richard & Sammells, Neil ed. *Writing the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Zed Books, 1998.03)

Murphy, Patrick.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02)

Slovic, Scott. & Hart, George.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07)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吳明益，〈且讓我們蹣跚渡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的可能性〉，《東華人文學報》9期（2006.11），頁177-214。

——，〈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重詮宋澤萊《打牛湳村》到《廢墟台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2），頁177-208。

——，〈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關於原住民漢語文學中所呈現環境倫理觀的初步思考〉，《中外文學》37卷4期（2008.12），頁111-147。

——，〈造心景，抑或安天命？論劉大任《園林內外》中的園林觀與書寫特質〉，《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5期（2009.12），頁199-232。

林于弘，〈臺灣生態詩的萌芽與茁壯〉，《靜宜人文學報》17期（2002.12），頁31-

52。

曾珍珍，〈生態楊牧——析論生態意象在楊牧詩歌中的運用〉，《中外文學》31卷8期（2003.01），頁161-191。

（二）學位論文

簡義明，〈臺灣「自然寫作」研究：以1981-1997為範圍〉（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

（三）研討會論文

吳明益，〈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笠山農場》中人們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亞太文學論壇」會議論文，《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高雄：台灣筆會，2004），頁89-111。

——，〈傳遞知識是為了討論價值：談臺灣科學／科普書寫中的幾個議題〉（生態關懷者協會、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世界地球日（二）」『人文生態與科學生態對話』國際工作坊」論文，2009.06）。

劉克襄，〈九〇年代台灣生態旅遊指南的趨勢〉，「淡江大學國際生態論述會議」論文（淡江大學英文系主辦，2000.10）

Moran, Thomas E. “Green Mountains／青山——The Cultural Reordering of Nature／自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講座書面稿，2007。

三、其他

Slovic, Scott. “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生態哲學與生態論述未來方向」工作坊（淡江大學英文系主辦，2009.07.15-16）。來源：演講ppt。